

# 和平是每个人最朴素的期盼

葛水平



一切温暖的事物变得黑暗而悲伤。翻阅海量史料时，我看见太多乱世中的普通百姓，他们并非对世事漠然，只是被恐惧深深裹挟，比起绝境中挣扎求生的能力，他们连预判战争降临的力量，都微弱得让人心疼。

写作情感的限度，其实就是爱的能力的限度。八木下弘是侵略者，是间谍，也是人性的分裂者，他目睹日军暴行后良知觉醒，在愧疚与痛苦中自我救赎，最终以死亡赎罪；张子民有着民族大义，却也有思想观念上的偏见与局限，对绿萍的伤害，也折射出战争对普通家庭的深层摧残。这些复杂、多面的人物，都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战争里真实的生命，他们的善恶、挣扎与痛苦，都是战争最真实的写照。

《和平》写作中，我曾两度陷入停滞。初次动笔时的满腔热忱与壮志，在写到十万字，真正深入战争题材内核时骤然碰壁，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正踏入一片全然陌生的领域，知识储备的不足让我举步维艰。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选择迎难而上，沉下心来补齐短板，继续前行。第二次卡顿，源于一块深埋地下的石碑，碑上“我死国活”四字，瞬间狠狠击中内心，带来极致的震撼。可被感动是一回事，将这份直击心灵的震撼，妥帖转化为文字、融入作品之中，又是另一重考验。

在《和平》中，我将钟表化作时间的具象，它寓意着作为第四维度的时间，每秒均匀跳动的刻度，都在丈量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可在这规整冰冷的刻度里，又有多少鲜活的生命悄然消失？他们来过这世间，却从

未尝过安稳好日子的滋味。

时间又像从久远记忆里走出的影子，轮廓模糊，却带着撼动人心的重量。人间烟火是一根细密的针，串联起时代的肌理与脉络。

女性在苦难中拥有的生生不息力量，是我在小说中着力表现的。我在小说中写了一个捡出豆子发豆芽的婆婆，当炸弹落下时，她下意识地往空碗里扔黄豆，一共98粒。她不识数，端着碗站在街口，想告诉世人日本人扔了碗中豆子一样多的炸弹，可她最终只听见自己从心脏深处发出的惨叫。儿子被炸得只剩半截身子，她哭喊着“不如我伸脖子让日本人一刀，天爷爷把我儿换回来”。还有那些寻不到丈夫全尸的妇女，哭喊着“我这里有个头，谁给我换一条腿”。

我写翠红的情感，与其屈辱活着，不如以死抗争，从弱者变成能报仇的“厉鬼”。可那些在战争威逼下幸存的女性，即便掩埋身体与灵魂的剧痛，或以死明志，仍在废墟上擎起家国与民族“生”的希望，与男性如“共命鸟”般，守护着乡土中国的精神年轮。

《和平》中塑造的绿萍，是文本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感枢纽。日军占领奉天，绿萍的父母死于毒气弹引发的瘟疫，家被炸毁，丈夫任职的邮局也被侵占。邮局上司意大利人巴士地地对张子民说：“你不想做亡国奴我理解，你走得我走不得。派你去陕西潼关吧，日本人过不去黄河……中国的年轻人，你要多生娃娃，不为什么，就为了国家将来有扛枪的人！”

活着，就是抗争。她用生育守住了民族延续的希望。小说以一个个“死亡之镜”，竭力证明战争是最非人

性的存在。而八木下弘的视角，让战争的残酷有了更复杂的维度——他既是侵略者，也是人性的觉醒者，亲眼目睹百人斩、活体实验、细菌战等暴行，在良知与使命间撕裂，成为战争罪恶的见证。

小说以张子民、八木下弘、绿萍的生命时间、心理时间、情感时间为脉络。创作途中，我一直苦苦找寻能与战争年代相称的情感，落笔书写人物身体与命运的种种变故时，始终要求自己遵从人性、不带任何偏颇情绪去刻画。当我们剥离战争的宏大叙事，回归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本身，会发现这些在战争中承受沉重屈辱与无声牺牲的人，理应得到应有的尊重。

面对任何一场战争，我们都不该轻贱任何一个生命，我们应永远铭记战争带来的无尽的毁灭与伤痛。我们穷尽一生追求的，不过是世间再无硝烟，人人皆能安享太平，让“和平”二字，不再是乱世里遥不可及的奢望，而是寻常人间的岁月静好。

在书中，我书写战争对每一个个体的摧残，书写人性的光辉与阴暗，最终只想诉说：和平，是每一个平凡生命最朴素的期盼，是人类文明最珍贵的归宿。愿这段历史被铭记，愿那些无声的生命被看见，愿世间再无硝烟，和平之光照亮每一寸土地。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 创作谈



一个问题：当我们在不同学术语境中看同一部作品时，能否在差异中找到一种可持续的对话方式？季进的回答是乐观的。他用“巴尔干化”和“克里奥尔化”两个概念描摹海外传播的复杂权力构型，又用“超文化”来消弭时空界限，让不同研究在关键词汇聚中重叠对话。这不是要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寻找“并发与互文”的研究形态，以此提出并回应海内外中国文学学术共同体如何可能之间。

书中有个段落写得好：“我们应该在‘我看’和‘他做’之间看到落差，阐明实质，挖掘对话潜能，形成逻辑上的正反合。”这话朴素，但分量不轻。它意味着学者需要兼具两种眼光：一是本土的、深情的；一是世界的、自省的。两者叠加，才能产生视差深度。季进想要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化，不是一条单行道，而是一场双向的、有痛感也有惊喜的跋涉。而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恰恰藏在那些“视差之见”里——你从这边看，我从那边看，风景不同，但山还是那座山。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主编)



茂师傅从捕蛇高手蜕变为“田园守护者”时，我看到了一个转身，从索取者到守望者的精神蜕变。

作家于后记《后视镜里的风景》道出其创作观：“小说朝前看、诗歌往里看、散文往后看”，这正是邓跃东散文美学的核心。回望绝非沉溺，而是为了更稳健地前行。如同行车必借后视镜，当代人在城乡、传统与现代间穿梭往返，亦需散文这条“拭面的巾”，擦去遮蔽视线的尘土，看清来路与归途。

《云山来信》的价值，在于其为现代人的焦虑提供了一剂文学治愈良方。邓跃东不回避城乡碰撞的阵痛，而是以散文的针线，将零落的记忆与经验缝合，绘就一幅完整的心灵地图。

读罢《云山来信》，那些文字间飘散的炊烟、躬耕的背影、市井的吆喝，已然化作映照人类存在境遇的明镜。这部散文集提示我们：真正的返乡，绝非地理上的回溯，而是一场指向内心的精神朝圣。

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

## 跨越山海，以诗为名

本报记者 张鹏禹

5月9日—1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深圳、北京三地举办。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42位青年诗人、6位汉学家和作家与中国的42位青年诗人和12位特邀诗人、作家、翻译家参加活动。其间开展了诗歌朗诵、学术对话、文化参访等20余场活动，搭建起中阿诗人沟通对话的桥梁。

5月9日晚，广州市文化馆，随着13位中外诗人共同按下灯塔装置，屏幕上的湛江硇洲岛灯塔被点亮，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正式启幕。开幕式以海丝溯源为开篇，融合情景演绎、诗歌朗诵、非遗展演与传统民乐，缓缓铺展千年海上丝路恢宏画卷。节目《海丝·同心》中，中国当代诗人高鹏程的《蔚蓝》、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船的到来》、唐代诗人张九龄的《送韦城李少府》被艺术化演绎，展现中阿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情景朗诵《羊城诗韵·天方》之《青春中国：兼致阿拉伯青年诗人》表达对阿拉伯青年诗人的热烈欢迎，诗作以深情笔触祝愿中阿文明“各自发光，彼此照亮”。

在广州活动期间，诗人们先后走进广东文学馆、广东非遗馆、小鹏科技园和广州市文化馆等地，感受岭南文脉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活力。在深圳活动期间，他们参观了华为总部、腾讯总部等地，触摸现代中国的创新脉搏。

长城诗会是历次国际青春诗会的重头戏。5月14日，中阿诗人开启北京段行程，首站便来到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长城诗会融诗歌、音乐、舞蹈、演唱、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让古老的世界遗产与青春诗意相互碰撞。中国诗人何向阳与埃及翻译家、作家米拉一同用各自母语朗诵了诗作《长城》，展现诗歌跨越语言的魅力。何向阳的这首《长城》，正是由米拉译介到阿拉伯世界。米拉表达了在长城朗诵自己译作的激动心情，直言：“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北京活动期间，诗人们走进北京市琉璃厂、国家大剧院开展文化探访，并观赏舞剧《王阳明》，近距离感受古都文化魅力。在北京师范大学交流期间，中国诗人西川分享了自己喜爱的两本阿拉伯诗人诗集《生命之歌：沙比诗集》《玫瑰朝上》。他表示，《一千零一夜》等阿拉伯文学经典在中国家喻户晓，希望此次活动能进一步增进中阿文化交流。

此次活动的最后一站是故宫博物院，红墙黄瓦掩映下，诗人们边走边聊，为此次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几天时间里，中外诗人结下深厚情谊。中国诗人贾想被巴勒斯坦诗人纳捷宛·达尔维什的诗歌《身份证》触动，写下《当我读到真正的诗歌》回赠对方。中国诗人罗禹墨给约旦翻译家马娜留言：“此间相惜别，他乡再聚首。”

诗会最后，中阿诗人在展示此次活动精彩瞬间的照片墙前拥抱、合影，为彼此送上美好祝福。大家表示，国际青春诗会不仅搭建起中阿诗歌交流对话的平台，更播撒下友谊的种子。

希望此次活动能进一步增进中阿文化交流。

此次活动的最后一站是故宫博物院，红墙黄瓦掩映下，诗人们边走边聊，为此次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几天时间里，中外诗人结下深厚情谊。中国诗人贾想被巴勒斯坦诗人纳捷宛·达尔维什的诗歌《身份证》触动，写下《当我读到真正的诗歌》回赠对方。中国诗人罗禹墨给约旦翻译家马娜留言：“此间相惜别，他乡再聚首。”

诗会最后，中阿诗人在展示此次活动精彩瞬间的照片墙前拥抱、合影，为彼此送上美好祝福。大家表示，国际青春诗会不仅搭建起中阿诗歌交流对话的平台，更播撒下友谊的种子。

## 专家研讨《晋察冀戏剧研究》

本报电（记者 赖睿）“赓续红色文脉 共探文艺初心——《晋察冀戏剧研究》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河北大学艺术学院举行。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来自京津冀等地的专家学者、师生代表共同参与。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其戏剧运动是革命文艺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赵然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基金项目成果《晋察冀戏剧研究》（人民出版社），系统整理

了晋察冀戏剧的珍贵史料，深入考察其发展脉络、精神内核，史料翔实、体系完整，在学术视野、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创新。

专家学者在研讨中认为，《晋察冀戏剧研究》一书将晋察冀戏剧置于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拓展了革命文艺研究边界；其交叉学科的研究路径，为红色戏剧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大家表示，晋察冀戏剧研究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对于当前新大众文艺的开展具有借鉴作用。

##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 文学艺术融合公益行启动

本报电（朱彬琳）近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学艺术融合公益行启动仪式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活动由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主办。此次公益行旨在通过“文学+艺术+公益”的跨界形式，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重走长征路，用笔墨和文字书写山河巨变。

启动仪式上，展示了多位书画家的主题作品。随后，多位艺术家表演了诗朗诵《于都

河》《绿色军装 一声情怀》、评书《吴起扬威》及歌曲《映山红》《再见大别山》等节目，展示了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感召力，生动表达了当代文艺工作者对红色血脉的赓续传承。

据悉，此次公益行以“红船映初心 文艺颂长征”为主题，将组织作家与艺术家前往嘉兴开展采风调研，把红船精神与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生动的文艺作品，推动红色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广泛传播。

## 批评前沿



## 视差之见中的双向照亮

——读季进《世界中的当代文学》

宋炳辉

这不是拼盘，而是脚手架——把“走出去”这个老话题，架到了文化政治、翻译伦理和世界文学机制的多层地基上。从“现象”到“系统工程”，季进决意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中转换视野。

季进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深耕20多年，对汉学家的熟悉，使全书读来有种“自己人”的味道。他不只读他们的书，还访谈过其中大多数人。这种在场感使他在处理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人所构成的学术脉络时，不仅说得清观点，还能道出观点背后的学统、偏见与困境。比如他梳理出作为文献、学科、方法和机制的四种研究框架，把海外汉学从“别人怎么评价我们”的简单猎奇，提升到知识生产机制的分析层面。这等于说：别只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好不好看，先搞明白这面镜子是怎么磨出来的、谁在磨、磨给谁看。对当代作家的跟踪式阅读同样见功力。他写刘亮程的《本巴》，看出这位新疆“隐士”如何从蒙古族史诗中提取梦意象，用一种最“全球化”的方式回应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命题。写迟子建《东北故事集》，指出那些古史旧事，也是当代的历史镜像。阿来、麦家、毕飞宇、格非、莫言、刘亮程等14位作家次第登场。季进不堆砌术语，而是用敏锐的直觉抓住每个作家的要害，再放到世

界文学的参照系里掂量。这种“个案+比较”的写法，让全书有了血肉。

这本书最精彩的理论推进，或许藏在《视差之见》一文里。季进坦率承认：海外与本土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阐释，存在观念、材料、方法和价值四个维度的分歧。不同的学术语境、问题意识、读者预设，必然产生不同的“看”。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些分歧？季进认为视差本身有生产力：海外学界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一面他者的镜子。我们透过镜子看自己，看到的是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才能看到的侧影。“作为方法”的海外汉学有多重面向，有些是海外学者自觉的方法论，有些则是本土观察者的归纳。主客观交融，已经很难拆解。但恰恰是这种模糊地带，蕴藏着对话的可能。跨文化研究需要一种“分寸感和界限感”，既不神话他者，也不闭目塞听。在作者看来，理想的做法是不争谁对谁错，而是承认差异，然后以对他者的理解为起点，回头反观自身。总之，在季进看来，视差不是障碍，而是资源。这让我想起他在“走出去”之后又提出“走回来”——走向当代文学本体，走向多元协商，走向民间交流，走向人机对话。“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回来”，这才是完整的循环。

这本书看上去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进入世界”，骨子里问的是另

## 文字作巾 拭尘见心

——读邓跃东散文集《云山来信》

祁云枝

况——我们都在等待某种确认，却未曾察觉那确认早已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舅爷的冷峻成为邓跃东成长的磨刀石，而漫长的写信过程，则是一场孤独而丰盛的心灵修行。当作家恍然大悟“他本身就是一封信”时，这场单向对话终于抵达终点。这恰是整部散文集的精神内核：我们跋山涉水寻找的答案，其实就埋在出发时的脚印里，只是被时光的落叶层层覆盖。

书中的其他篇目，同样是对精神返乡的诠释。邓跃东用文字架起返乡之桥，重释了“诗与远方”。这远方，未必是壮阔风景，而是能沉淀心灵的烟火人间。

《长夜》中父子同榻的细节，将对

乙肝的态度悄然转化为检验亲情的试金石。当儿子最终掀开另一侧被子躺下，这不仅身体的靠近，更是一次无声的伦理确认与情感回归。邓跃东的家庭叙事浸润着人类学视野，他将父亲蜷缩的睡姿、祖母晾晒旧衣的执着、母亲病床前的坚守，都提炼为鲜活的文化传承样本。这些细节如同暗夜行车的灯光，骤然照亮了中国式家庭情感的幽深角落。那份深藏于沉默、甚至别扭之中的爱，唯有历经长夜跋涉，方能抵达彼此的理解。

邓跃东擅于捕捉生活里的微光。在《长夜》中，他以被角丈量亲情，这种化俗常为神圣的笔力，正是其散文的独特魅力。《美丽的水稻》中，当



邓跃东的散文集《云山来信》以湖湘山水为底色，通过“光景”“气象”“月影”三个篇章，编织出一幅当代人精神返乡的图景。

《云山来信》是书中的一篇散文，也是这本书最动人的隐喻。那个三十年如一日给舅爷写信却始终未获回音的少年，他的执念看似是对认可的渴望，实则映射着现代人共有的精神境